溝通媒介對遠距關係中之 軍人與配偶維持情感之影響— 美軍相關研究文獻之後設分析

邊明道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副教授

摘 要

「軍人」是社會中較為特殊的職業群體，軍人伴侶和家人的溝通是否健全順暢，關係到其在工作崗位上的表現。而「軍人」這個具高度危險，又經常與長期派駐輪調的職業屬性，對其與伴侶和家人關係的維持造成巨大影響。這些是國軍應當被重視但卻經常被忽略的問題，尤其有關國軍如何藉由媒體科技與伴侶和家人之連繫與溝通行為，目前本土性研究還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之研究方法是綜整在美軍軍事脈絡下的實徵研究文獻，並以「媒介豐富性」與「媒介同步性」相關理論做為分析架構，歸納出結論和未來研究建議。以期探討出各種溝通媒體科技運用於軍人長期派駐在外時，與眷屬遠距溝通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溝通媒體、軍人、配偶、遠距關係、媒介豐富性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on Military Spouse Relationships: A Meta-analysis of U.S. Military Literature

Min-Dau Bi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litary is a special group in society, and we wonder: Is the military professionals'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families related to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job? What kind of impact will these professionals' job characteristics have on their marital relationship? These are to be taken seriously but often overlooked issues. From many officers' experiences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past, family problems, especially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ouse, often result a bad mood for most military officer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media richness and real-time media, this paper studies current ways of communication for military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ir family lives and job performances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edia, military, spouse,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media richness

壹、前言

家庭問題，尤其軍人是與配偶處於經常性分離與遠距離關係所產生的溝通問題，是造成國軍官兵心緒的大部分主因，加上軍人長時間在營區駐守或執行任務，對家庭的照顧可能疏於周全，另一伴隻身處理所有家務，軍人與軍眷兩者皆不好受。朱美珍（2001）在國軍志願役軍官家庭與工作之研究發現，家庭大都給予軍人相當高的支持度，尤其，來自配偶的支持最大，配偶所給予的支持中，又以情緒性的支持最多。伴侶和家人無私的支持，能讓另一伴安心的在部隊工作。因此，當軍人面對可能破裂的婚姻關係、或不穩定的家庭關係時，可能失去其精神依靠，而導致工作及任務無法順利完成。即便近年來，國軍致力落實「三安政策」，推動官兵調往眷籍地服務等措施，但對官兵家庭的照顧成效，缺乏相關的實徵研究加以研析。再加以面對新型態傳播與溝通媒體的普及（如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對官兵與家庭的聯繫上，有沒有更加強「軍人安家」與「軍眷安心」等政策作為的效益，殊值探討（黃美慧等人，2014）。

相形之下，自兩伊與阿富汗戰爭以來，已有為數兩百萬的美軍曾經佈署在戰區，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派駐戰區兩次以上。美軍雖然預計於 2016 年底自中東戰區撤軍，但其軍事人員仍遍佈全球各地的美軍基地。許多研究證實，美軍不論是派駐在國內或是海外，每位派駐軍人的都必須承受大小不一的壓力，但其中家庭因素總是軍人個體最大的壓力來源（Greene, Buckman, Dandeker, 和 Greenberg, 2010）。同時，只要家中有人派駐戰區，家庭裡的所有成員同樣承受高度壓力，並面臨心理性與社會性的問題風險（Wong 和 Gerras, 2010）。

雖有愈來愈多的研究從事於軍人在長期派駐後(post-deployment)返鄉身心調適的問題(Sayers, Farrow, Ross, 和 Oslin, 2009)。但至今仍缺乏有關於整個派駐循環週期中(deployment cycle)其他階段的研究。一項關於曾經經歷派駐的美軍軍人配偶的研究，發現 62%的配偶自述最大的壓力發生在派駐期(National Military Family Association, 2005)，也有美軍軍事人員自評在駐外期間是婚姻關係的改善期，但也可能是惡化期(Newby 等人, 2005)。因此，針對必須經常與長期分開的軍人與配偶關係的研究，實有必要持續補強。

從原本居住在一起到必須遠距分開，溝通媒介成為軍人伴侶們適應「分離過渡期」的重要關鍵(Merolla, 2010a)，因為伴侶家人即使分離仍能保持連繫對話，是維繫關係品質的要件之一(Merolla, 2012)。就軍人家庭而言，既使在派駐時期，若夫妻能保持溝通連絡，尚能維繫甚至有可能深化親密關係(National Military Family Association, 2004)。但持反對意見的研究認為，長期只能與配偶遠距聯繫，會讓駐外士兵感到無助感與精神渙散(MacDermid 等人, 2005)。

事實上，隨著新傳播科技的普及與功能提升，使得官士兵們在派駐期與家人配偶連絡的方式和頻率已有大幅改變與進步 (Ender, 1995; Schumm, Bell, Ender, & Rice, 2004)。

因此，本研究分析方向是為關注軍人伴侶在遠距與長期分離的情境下，審視雙方使用媒介溝通所產生的動態關係。主要的研究問題是，軍人這個具高度危險又經常與長期派駐輪調的職業屬性，在派駐期間軍人伴侶是如何連繫與溝通的？長期派駐輪調的工作屬性是否是造成軍人與眷屬的連繫和溝通的主要障礙？甚或是軍人婚姻關係維繫的最大的困難？

在過去，美軍相關研究單位曾有零星研究審視軍人在佈署期與伴侶或配偶遠距溝通的經驗。本研究在臺灣本土軍事研究完全缺乏的情況下，整理和探討美軍的實徵研究論文以歸納法形成結論和建議，以提供台灣未來研究方向與軍人營區管理之借鏡。以下即為本文之研究目的：首先，聚焦於文獻中之軍事人員使用不同媒體的模式與頻率；其次，整理文獻中所提之各個媒體在遠距溝通上的優缺點；第三是分析駐外軍人與家人溝通的內容類型；最後是提供未來研究議題與諮商輔導之建議。

貳、遠距關係與溝通理論

欲瞭解伴侶間是如何克服地理空間上的隔離，必須先考量伴侶之間的溝通模式為何，也就是要從更廣泛的關係脈絡來理解溝通行為。Stafford 和 Canary (1991)主張在人際關係脈絡下，將溝通行為分類成：「正向型」(即口頭讚美與行為互動時表現喜悅)；「開放型」(即能與人討論情感關係或能鼓勵它人揭露想法與情感)；「支持型」(即能用肢體與行動展現關愛和承諾)；「關係網絡型」(即能建立人際共同關係網絡)以及「任務型」(即能分擔責任)。以上五種是藉行為溝通來維繫關係的策略，也是伴侶對關係滿意程度與關係品質的表現。但有些研究發現，若將上述行為同時考量時，開放性溝通行為與關係滿意度呈負相關 (Dainton 和 Aylor, 2002; Stafford 和 Canary, 1991)。

Merolla(2010a)將遠距關係中的溝通行為分成三大類：個體內溝通 (intrapersonal)(只涉及單一個體的溝通行為，例如個體自我思索和寫個人日記的行動)；網絡溝通(networking)(例如尋求他人支持的行為)；以及二元(dyadic)雙向溝通(包括伴侶兩造共同溝通的行為。最後一類是指伴侶遠距直接溝通的行為(例如視訊通話)。本研究將聚焦於探討二元雙向遠距溝通的相關文獻。

此外，在派駐期間的伴侶溝通，所使用的溝通媒體是另一個研究重點。自1980年代開始，以郵寄信件與親友溝通的形式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電話

與電子郵件(Dimmick, Kline, 和 Stafford, 2000; Ledbetter, 2008)。近期的視訊電話科技(例如 Skype)則是另一種重要的遠距溝通工具,目前相關研究則付之闕如。所有的溝通媒介有兩種重要特質:一是媒介豐富性(media richness)是某特定媒介所具備的視覺、聽覺與觸覺三種線索(cues)的多寡程度,舉例而言,視訊電話比語音電話的媒介豐富性來得多,因為視訊電話多了視覺線索。相對的,電子郵件沒有聲音、影像與觸感,因此媒介豐富性則更低。第二個媒體特質是同步性(synchronicity),是用來區分即時或延時回應的可能性,例如非同步的郵件溝通,有所謂的停機期(downtime),而電話則可提供同步性的對話溝通。

不同的溝通媒體,有不同程度的媒體豐富性與同步性,媒體的這兩種特性會影響伴侶的溝通行為與情感關係。例如電子信件是遠距關係中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Dainton 和 Aylor, 2002),儘管電子信件的豐富性與同步性受限很大,但有人形容,有限的媒體豐富性是一種「限制也是解放」(Walther, 1996, p. 3)。就許多人來說,電子信件缺乏媒體豐富性往往造成溝通效果不佳,原因是伴侶們時常需要有深層的情緒支持與連結(Boase 和 Wellman, 2006)。但也有研究顯示電腦中介的溝通模式,可以產生所謂的「超人際」¹(hyperpersonal)關係的溝通模式(Walther, 1996)。例如,非同步溝通模式可允許思考更周延的訊息回應,也可以讓個人更謹慎的形塑自我,和斟酌訊息的發送(Utz, 2007; Walther, 1996)。此外, Jiang, Bazarova, 和 Hancock(2010)發現透過 e-mail 揭露情感比面對面表達更具親密感。所以對某些類型伴侶的互動模式,較低的媒體豐富性,反而能強化溝通效果(Tong 和 Walther, 2011)。對於身處不同時區以及生活作息步調不一致的伴侶, email 提供個體額外且不須要即時互動的溝通緩衝(Boase 和 Wellman, 2006)。Email 也有自動存取可供日後讀取和參考的功能(Utz, 2007)。e-mail 此項功能可以讓個體能從事自我心理的修復,既使伴侶不在身旁,電子信件提供重複閱讀與自我回想的機會;反覆閱讀「支持性」的文字,亦有維繫情感關係的功能。此外, email 有轉傳的功能,可以增強「網絡溝通」達到維繫關係的效果(Boase 和 Wellman, 2006)。因此即使電子信件的媒體豐富性較低,但反而強化非「二元溝通」的優點(Merolla, 2010a)。

與電子信件相較,電話的媒體豐富性反而是分離的伴侶們,另一種溝通形式的選項,有研究顯示電話溝通的滿足感比電子信件來得高(Dommick, Kline, 和 Stafford, 2000)。過去研究印證出,為維繫遠距離的親密友誼,使用電話的頻

¹Walther(1996)在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了 CMC 中的「超人際」(hyperpersonal)交往這個概念,意指「電腦中介傳播所提供的互動經驗比面對面(face to face)所能提供的更讓人渴求。」(Walther, 1996)。

率會比電子信件來得高(Utz, 2007)。更近期發展出的同步溝通媒體，如視訊電話(例 Skype)與即時通訊(例 Line)，則截至本研究資料蒐整期間，尚未有最新學術研究文獻發表。有一項以 225 位美國大學生之即時通訊的使用者調查，結果顯示，談戀愛中的情侶最喜歡即時通訊，情侶們將即時通訊評為較佳的遠距溝通工具(Ramirez 和 Broneck, 2009)。但情侶們給予即時通訊在溝通品質面向上較差的分數，是因為即時通訊在媒體豐富性上的分數不高，又缺乏電子信件的優點，因此即時通訊未必是最理想的溝通媒體。另一方面，視訊電話則同時兼具媒體豐富性和即時性，是比即時通訊和語音電話多一些優勢。初步研究顯示遠距離分離的伴侶是比較常使用視訊電話(Greenberg, 2012)，但仍缺乏足量的學術研究證明。

在遠距關係的脈絡下，不同的溝通媒體有不同的豐富性與即時性，亦能帶來不同的溝通效能。西文文獻中為派駐而遠距分離的伴侶所做的研究，已有相當的學術基礎，但軍事派駐則有幾項特殊狀況是不同於政府與企業的外派，首先就是軍事派駐有極大的安全考量；其次是軍事人員在執行任務時需要有強大的專注力與壓力耐受度，因此先前的一般派駐的研究結果，無法完全適用於軍事情境。因此，本研究採文獻探討與後設分析的方式，比較與綜整遠距關係文獻間的相似與差異處，並從中發掘軍人與家人遠距溝通之需求。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探討與後設研究之概念進行。我們先在西文學術網路蒐尋器(Google Scholar)、以及西文心理學術資料庫(PsycINFO)、西文傳播與媒體學術資料庫(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等三個，採用英文語詞如下：military, deployment, communication, 以及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等四個，以複合方式搜尋論文，本研究所設定的資料庫文獻蒐整期限設定約從 1980 年到 2016 年之間。此外，我們也查詢三本英文軍事期刊(2001 到 2016)線上目錄包括：*Military Psychology*, *Armed Forces & Society*, 和 *Military Medicine* 等三本期刊，在排除碩博士論文和研討會論文之後，最後一共找 19 篇實徵型期刊論文(參見表一)。其中研究對象有 8 篇是軍人配偶，9 篇是軍事人員本人，以及 3 篇是軍事人員與配偶家人。19 篇論文中，有 11 篇是採質性研究方法(10 篇深度訪談；1 篇是日記文本分析)；10 篇是屬量化問卷調查法)。

由於我們先從中文文獻資料當中搜尋，採用與西文資料庫搜尋一致的字詞如下：軍事、佈署、溝通(傳播)、遠距關係維繫等 4 組字詞複合搜尋，結果沒有文

章符合。但研究者相信，除去目前國軍並無戰事，且地理幅員不若美國為全球駐軍之國，但台灣軍人派駐管理與軍事制度發展皆受美軍影響，若以美軍軍事人員與情境為對象之研究，或可為我國軍管理與心理輔導借鏡參考。

此外，為配合本文之研究目的，本文之文獻探討從三個面向來分析與討論：首先，聚焦於文獻中軍事人員使用不同媒體的模式與頻率；其次，整理文獻中所提之各個媒體在遠距溝通上的優缺點；接著分析駐外美軍與家人溝通的內容類型；最後是提供未來研究議題與諮商輔導之建議。

表一 本研究所整理與分析之軍人與伴侶遠距溝通的文獻(自 1990 年到 2015 年)

論文	參與者樣本研究方法	
Carter 等 4 人(2015)	163 名陸軍	量化問卷
Seidel 等 4 人(2014)	39 名國民兵配偶	質化(日記)
Cigrang 等 7 人(2014)	141 名空軍	量化問卷
Huston 等 5 人(2014)	13 名國民兵配偶	質化深訪
Hinojosa 等 3 人(2012)	20 名國民兵	質化深訪
Ponder & Aguirre(2012)	119 名退役軍人	量化問卷
Rossetto(2012)	26 名駐外軍人配偶	質化深訪
Carter 等 6 人(2011)	193 名陸軍	量化問卷
Caska&Renshaw(2011)	224 名國民兵	量化問卷
Durham(2010)	6 名退役軍人	質化深訪
Joseph & Afifi(2010)	105 名至少有 1 個子女軍人配偶	量化問卷
Lapp 等 6 人(2010)	26 名駐外軍人配偶	質化深訪
Merolla(2010b)	33 名駐外軍人配偶	質化深訪
Sahlstein 等 3 人(2009)	50 名駐外軍人配偶	質化深訪
Faber 等 5 人(2008)	16 名陸軍和 18 名家人	質化深訪
Kim 等 6 人(2005)	6 名軍人配偶	質化深訪
MacDemid 等 6 人(2005)	27 名駐外軍人且具子女	質化深訪
Schumm 等 4 人(2004)	500 名以上駐中東之陸軍	量化問卷
Ender(1995)	800 名駐中東之陸軍	量化問卷

肆、討論

一、溝通媒體使用頻率與種類

以美軍派駐文獻為例，派駐人員依不同時間、派駐地點、任務，在使用溝通媒體上存在極大的差異。本研究以 2015 年底做為文獻搜尋截止期，其中有 8 篇是研究美軍與伴侶所使用的連絡溝通媒體，有 6 篇是研究兩伊戰爭時期美軍派駐人員與伴侶和家人的連繫方法。針對這個主題，最早的研究是 Ender(1995)對 800 位在 1989 年派駐巴拿馬的美軍和平部隊成員的量化研究。這個時期是首度部署外國的美軍可以使用國際長途電話，因此電話是最常被受測者提及的媒體。但是這個時期尚無行動電話，因此此時所討論的電話媒介不適用說明目前手機普及的世代。

Schumm 等人(2004)的研究對象是 1995 駐紮在以色列西奈半島的 500 多名的美軍，此論文是唯一的長期性研究，蒐集了這些軍人從事和平任務前與後各 6 個月的資料。該研究先測量這些樣本在派駐前對於使用聯絡媒體的期待評估分數，在派駐結束後再施測這些樣本對於各種連絡媒體的滿意度。這篇研究也是至今唯一的研究，讓同一樣本對不同的媒體做預期與回憶的使用評估。雖然個體對不同媒體的期待不一，但是個體對於派駐前的預期使用頻率，與派駐後的使用率回報沒有顯著差異。正如個體在派駐前的預期，這個時期的美軍使用最多的是郵寄信件(有 40%的人每星期有 2 到 6 天會收發信件)。而電話反而使用頻率較少(大約是 1 個月使用 1 至 3 次)。同時，已婚軍人在駐外期也被預期比單身軍人更常使用溝通媒體與家人連繫。但是要注意的是，從 1995 至 2015 之間有 20 年的科技落差，上述研究發現不能推論至今日駐外美軍的溝通連繫媒體的使用行為。

另外，有兩項在兩伊戰爭時期的質性研究結果是對立的，MacDermid 等人(2005)是研究軍事人員駐外時期的父親角色，研究者收集 27 位從駐地返家的軍人樣本，有一些軍人回報自己是高度使用溝通媒體的人，有一個軍人案例甚至要求妻子將家中電話接上擴音器，好讓自己能在工作時仍能聽見家中的一舉一動。相反的，也有一些樣本在訪談中透露自己必須等上 7 小時才能與家人用交談 15 分鐘。之所以有媒體使用時間長度與頻率的差異顯然與官階和軍種有關。例如在官階較低與後備部隊(reserve)成員的訪談中，比較常說他們有困難用電話聯絡家人。另一研究是訪問 20 位後備與國民兵(National Guard)，也發現由於他們屬於自己的時間受限，因此也必須等很長的時間才能使用電話(Hinojosa, Hinojosa, 和 Hognas, 2012)。此外，通訊技術若出問題也會產生人際溝通問題，例如夫妻正在用電話爭吵突然斷線，做妻子的會認為是先生故意掛斷的。以上幾

篇研究主要是探討軍人在營服役時所面臨的與外界連繫的差異與可靠性。

從軍人的配偶端來看，有一項針對 33 位駐外美軍配偶的質性研究發現，軍人配偶十分常使用各種連絡工具(Merolla, 2010b)。研究顯示駐地遠近位置影響差異不大(不論是伊朗、伊拉克、南韓、日本)，配偶的訪談內容歸納出結果發現，電話是最常使用的溝通工具(61%)，信件卡片與慰問物品(55%)，電子郵件(52%)也都經常被使用。相反的，即時通(15%)，視訊(9%)，網路聊天(webchat)(6%)相對較少被提及)。

最後，2010 年之後的三個量化研究則透露出各種電子連絡工具大量被駐外美軍與眷屬使用。Carter 等人(2011)研究 193 對曾經歷派駐兩伊的美國陸軍夫妻，而繪製出典型的美軍夫妻的通訊頻率，即電話、電子郵件、與即時通平均每天各一次。此外，有 60%的樣本回報會使用視訊平均一個月一次。Ponder 和 Aguirre(2012)的研究有類似的結果，但該研究樣本是 119 位從網路募集而來的退役軍人，所以駐地與外駐時間的差異性較大。而該研究之典型的通訊頻率是電腦通訊(包括 email、即時通、和網路視訊)、郵寄書信、電話等，幾乎是每對夫妻每天例行公事。

但 Cigrang 等人(2013)的研究則呈現不同的連繫模式，該研究的樣本 144 位有伴侶的駐伊拉克空軍，該研究的數據是只有 9%的樣本會每天使用電話連絡，但絕大部分會每天使用 email(70%)和即時通(61%)，這樣的演變可能說明，美軍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會使用電腦通訊取代電話。

整體而言上述幾項研究顯示，拜傳播科技之賜，駐外美軍已經可以透過各種媒體管道每天都能與家人連繫。比起二十年前駐外軍人與家人連絡的困難，已有絕對的提升與改善。但 MacDermid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則顯示，軍中對於連絡媒體的使用權限仍依官階、軍種、與駐地有所不同。此外，早期研究結果是，軍人樣本認為在駐地實際使用聯繫工具的困難度與預期落差不大(Schumm 等人, 2004)。過去相關質性文獻並沒有做過類似主題研究，但量化研究的結果則呈現出，當代軍人已獲得前所未有的通訊能力。

二、不同遠距溝通媒體的優劣比較

本文所探討的文獻中，有 9 篇討論到不同媒體的在遠距溝通上的優劣，但在結論評價上差距頗大。Ender(1995)研究對象是 1989 年在巴拿馬部署的美軍，由於部隊對於電話連繫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研究結果卻顯示好處和問題一樣多。基層軍事人員強調的是，電話能讓他們與眷屬保持連繫，長官則是認為士兵能與家人連繫有助於降低焦慮與提振士氣。但是官士兵如果在使用電話上有差別待遇，

反而造成低階士兵們的挫折感，也會導致配偶的擔心。

相較之下，Schumm 等人(2004)的研究對象是 1995 年駐紮在中東西奈半島的美軍，該研究發現部署人員給予電話在維持人際情感關係上很高的分數(包括表達支持、降低分離感、做決定等各方面)。軍人遠距關係研究也時常拿來與大學生的遠距關係來做比較(Dainton 和 Aylor, 2002)，因為兩者研究皆發現電話溝通能提供開放、支持、網絡、和分擔等功能。因此在 Ender(1995)的研究中，部隊長官雖然曾提出電話的負面效果。但上述兩項研究皆認定電話的同步性與媒介豐富性有助於情感關係的維護。但前述的兩項研究距今已久，而傳播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有必要針對與多媒體與數位媒體的世代再做比較分析。

上一節文獻中有一篇討論 27 位軍職父親的論文(MacDermid 等人, 2005)，論文內容提出，電話交談方式會讓駐地營區裡的軍人欠缺隱私保護，由於營區的嚴密管控，且公開的生活空間使得電話內容很容易被旁人聽見，雖然受訪樣本並未明確表示缺乏隱私空間是否會影響通話內容，但由士兵手握話筒的姿勢可以觀察出他們需要獨處的環境。較近期的論文研究 18 位從阿富汗與伊拉克返鄉的軍人就表示電話溝通在營區內會比較有壓力，而配偶們也表示因為怕漏接電話，她們的生活變會得很緊張(Lapp 等人, 2010)。這種生活壓力的來源，則由另一項研究結果得到呼應，Sahlstein 等人(2009)的研究針對 50 位曾駐紮在兩伊的陸軍妻子之訪談有同樣的結論。雖然手機日益普及，配偶漏接電話的情形已大幅降低。但長途或越洋電話訊號不穩定，以及駐地軍事勤務經常改變，亦會使得電話連繫無法固定時段。所以其他媒體如 email 和社交媒體可以做為輔助性工具，但在戰區駐地這些媒體的使用會受到限制且經常斷訊。因此儘管有新媒體與多樣的連繫管道，駐外軍人配偶的擔心依然存在。

近年網路媒體的出現已明顯改變駐外美軍的傳播溝通形式。網路媒體包括有 email、即時通、和視訊等。正因網路已被廣泛做為社交使用，截至 2015 年有 4 篇研究有關於駐外軍人使用網路媒體的情況。根據 Merolla(2010b)的研究顯示 email 是最通行的網路媒體，該研究是訪問駐外美軍的妻子，她們在彈性與便利性給予 email 很高的評價，這部分的結果與針對非軍事人員的研究結果類似(Boase 和 Wellman, 2006)。在 Lapp 等人(2010)的研究，18 位國民與後備兵的配偶也都認為軍人有海外派駐不同時區與彈性勤務的情形，伴侶雙方要找到固定時間進行同步溝通非常困難，因此 email 的非同步性(asynchronicity)反而是優點。Email 的另一個好處是可降低溝通障礙(例如時間限制與環境干擾)。最後，Houston 等人(2013)的研究對象是 13 位曾駐紮兩伊的國民兵配偶，研究發現 email 可以提高軍人與家人連絡的頻率，尤其是高頻連繫對化解子女壓力與困惑最有助益。但也有研究發現較高頻率的家庭連繫，也許可以化解孩子壓力，但相

對會提高他們的孤獨感。因此，該現象背後的矛盾機制仍有待研究。

目前有關網路溝通媒體的研究大多是將它們視為單一變項來評量(Carter 等人, 2011)。Ponder 和 Aguirre(2012)的研究曾個別評估不同網路媒體的溝通效果，該研究有 119 名曾駐紮兩伊的退役軍人，其中最常使用即時通的樣本所回報的關係滿意度的平均分數最低(2.80 在 4 分尺度)，使用 email 最多的樣本給關係滿意度的平均分數最高(3.59)，其次是視訊(3.43)，但是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原因是回答即時通的樣本數是 7，視訊的樣本只有 4，也因此限制研究結果的解釋力與信度。同時上述相關性可能與使用者年齡層與軍階有關，例如較年輕的軍人夫妻與軍階較高者都可能是使用網路較多的族群(MacDermin 等人, 2005)。因此有更深入探討的必要。

網路視訊傳播也是遠距溝通中是媒體豐富性最高的傳播媒體。但截至 2015 年底，並無網路視訊傳播的效果研究發表。在 Ponder 和 Aguirre(2012)的研究中，網路視訊在駐外美軍的使用頻率是僅次於 email，可惜的是該項目也只有 4 個樣本，因此統計量並不顯著，也無法推論。一般推測網路視訊傳播的媒介豐富性也許對在家配偶有較高的溝通滿足感，但對於駐外的另一半則未必如此。總之，相關論證仍有待探索。

如今，數位傳播科技進展一日千里，書信傳播反而不再是研究焦點。但在本文所採用的論文中，仍有 3 篇將書信列為駐外軍人與家人連繫溝通的工具來研究。另有一篇是探討書信與駐外返鄉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之間關聯。所有的 4 篇研究皆證實書信的優點。其中 Schumm 等人(2004)的 1995 年駐紮西奈半島之軍人樣本給予書信溝通中，在支持表現、訊息交換、連繫維持、與情感分享等四個面向最高的分數。在 Ponder 和 Aguirre(2012)的研究結果顯示，駐外期伴侶書信往返的頻率愈高，可以預測在駐外返鄉後的關係滿意度愈高。事實上，書信在其他所有溝通媒介當中，伴侶關係滿意度最高的。

Caska 和 Renshaw(2011)在駐外已婚軍人的研究也證實，書信連絡是唯一與關係滿意度相關顯著的溝通模式，就連電話聯繫模式與關係滿意度也並不顯著。Carter 等人(2011)的研究樣本是 193 名歷經兩伊戰爭的軍事人員，該研究發現非同步傳播(書信、email、慰問包裹)的頻率高低與婚姻美滿軍人夫妻罹患 PTSD 的比例呈負相關。如此看來，書信與其他媒體比較之下，似乎能提供較佳的溝通功能。Ponder 和 Aguirre(2012)則認為，也許軍人感覺書信較能自由表達感情，也比較少有資安上的顧慮。同時書信有助於個體內的自我溝通(intrapersonal)行為(Merolla, 2010a)，因為日記可以日後獨自再閱讀(Utz, 2007)。

最後，另有兩篇質化論文在軍事駐外脈絡下，探討非傳統的傳播溝通形式。

Rossetto(2012)訪談 26 位曾佈署在兩伊與阿富汗戰鬥與非作戰人員的女性伴侶。這些訪談內容討論到他們和另一半利用網路互寄文章、一起網購、或玩線上遊戲。一位受訪女性回憶起用越洋郵寄的方式與另一半玩桌遊(board games)。類似的情況在 MacDermid 等人(2005)的研究受訪者中,有一位軍人父親利用郵寄孩子作業的方式來教自己孩子數學。另一位父親甚至錄影說床邊故事再郵寄給孩子。這些都是有趣的個案,但可惜沒有研究再進一步評估這些非主流的傳播溝通方式的效益與優劣。

本節整體而言,是在軍事派駐脈絡下,討論不同傳播媒介的不同使用方式,也提供實證來說明各種媒體的優劣。理論上,媒體豐富性強的電話媒體與網路視訊能提供較開放的、可確認的、正向的溝通品質。但上述兩項媒體卻有降低隱私的缺點,而原有同步即時的優勢卻有引發突發性和負面衝突的可能。Email 和即時兩者雖媒介豐富性不佳,但有相對較優的同步性與可得性,適合有目的性的交談與確認需時短的溝通情境。尤其 email 具溝通彈性之外,更利於個體從事多重溝通行為,例如可有個體內溝通(intrapersonal);以及二元(dyadic)雙向溝通(包括伴侶兩造共同溝通的行為。Email 溝通行為允許個人先思考再書寫又可快速傳遞訊息,不失為一項遠距溝通的較佳工具。

近年,美軍在研究駐外人員的各種研究,在數量逐漸增多,但是實證型研究仍然不足,台灣則這方面基本上是掛零。雖然台灣沒有戰事亦無海外駐軍,但軍人與其配偶仍因駐地與工作不同,會不定期與長期分隔兩地的狀況,遠距傳播連繫的需要依仍存在,因此若有更具體地研究各種傳播科技屬性和優勢,才能給部隊中,分隔兩地的軍人眷屬們給良善的媒體使用建議。接下來介紹不同媒體載具上所傳輸的內容,才能增進對不同媒體傳輸的效果。

三、遠距溝通的內容

有關於軍人在駐外期與家人溝通聯繫的內容之相關研究是少之又少。Kim 等人(2005)分析 6 位另一半駐外的軍人配偶所寫日記,平均每位篩選 29 篇日記,並採用 Stafford 和 Canary(1991)所發展的 5 種關係行為(relationship behaviors)做為分析編碼類目,發現承諾(assurance)(23%)與積極(positivity)(13%)是在日記中最常提及的用詞策略。但該篇論文研究者查覺許多談話不屬於這 5 種關係,因此創造了「閑聊」(small talk)這一項,因為「閑聊」佔所有談話主題的 25%,比其他 5 種行為都多。這項發現也與另一項研究結論吻合,該研究發現 118 位軍人伴侶給每天日常的「閑聊」平均分數要比 94 位一般民眾對「閑聊」的分數來得高(Frisby, Byrnes, Mansson,

Booth-Butterfield, 和 Birmingham, 2011), 還有一研究也證明非軍事人員若對日常的「閒聊」行為評價愈低, 則對遠距關係的滿意度就愈差(Keating 和 Ledbetter, 2013)。但缺乏針對分隔兩地的軍人與伴侶的溝通內容研究, 所以目前的文獻無法有確切結論。

但是 Kim 等人(2005)發現, 駐外軍人與伴侶的談話主題通常是越想逃避的話題, 反而越是談話的焦點。有研究認為坦白與開放的交談, 未必一定有利於關係維持(Dainton 和 Aylor, 2002; Stafford 和 Canary, 1991)。研究越戰時期的退伍軍人與伴侶的論文就發現, 退役老兵愈誠實透露自己駐紮越南的回憶, 其伴侶的壓力反而愈大, 而老兵本人之 PTSD 也越嚴重(Cambell 和 Renshaw, 2012)。

此外, 另一重要考量是, 在戰區駐紮的美軍往往與家鄉父老子女越洋連絡之後, 反而無法專心戰備, 對於個人與單位都有潛在致命危險。Durham(2010)深訪 6 位打過兩伊的退役軍人, 他發現軍人會刻意自我限制連絡家人的次數、交談時間、與談話內容, 以便於能專心於任務。同樣的情節也發生在 MacDermid 等人(2005)的研究, 該研究的對象是 27 名剛派駐返鄉的軍職父親。這些父親談到與孩子交談完之後, 通常感到精神無法集中與身體無法放鬆。雖然上面兩個研究的參與者都說會逃避某些話題, 以便能專心工作, 但兩個研究最後並沒有提到逃避這個策略是否奏效。

目前沒有研究探討駐外軍人語帶保留的行為是否有助工作表現, 但 Cigrang 等人(2013)針對 144 位駐外空軍來探究與家人連繫次數多寡與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性。該研究發現與家人連繫頻率低, 反而讓情感壓力變低, 對任務執行產生較少的負面影響。雖然有 41%參與者回答, 在駐外期的配偶關係緊張到需要諮商治療, 但也只有 1/3 的人回答這種壓力困擾影響工作, 大該一個月只有一次。因此該研究數據告訴我們, 駐外軍人與眷屬的連繫的負面影響, 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

不過以上的論文是在探討駐外軍人與家人交談時多會語帶保留, 這是一種限制自我揭露的行為。接下來的兩篇研究, 是探究軍人配偶的自我保留心態。Joseph 和 Afifi(2010)的研究是在探索「保護緩衝」(protectivebuffering)與「保留訊息」(withholding information)的心理構面, 該研究樣本是 105 位軍人妻子。研究發現軍人妻子會以語帶保留的方式與另一半交談, 目的是以「保護緩衝」的心態, 來防止另一半接觸到壞消息。至於這種保護心態的強度, 與妻子感知到丈夫的安危處境強度有關。感覺上這種自述式的保護心理是出於良善, 但實際上是妻子負面身心狀況的表現。對丈夫的保護緩衝行為與軍人妻子的婚姻滿意度則呈顯著負相關, 但是在控制住連繫次數與時間變項, 則上述相關性就變得不顯著。Joseph 和 Afifi(2010)的研也發現妻子對資訊的保留程度(坦誠度), 與婚姻滿意

度以及軍人丈夫支持感知度是呈正相關。總之，這些研究結論是妻子對軍人丈夫善意的隱瞞，可能會對妻子的身心造成負面影響。而在 MacDermid 等人(2005)的研究也呼應上述研究，即身為駐外軍人並不喜歡伴侶的隱瞞行為，並不喜歡妻子猶如扮演家庭資訊的「守門人」的角色。

另一研究是 Rossetto(2012)深訪 26 位曾在兩伊和阿富汗服役軍人的女性伴侶，該研究結論是伴侶們都希望開誠佈公的溝通。因此有些受訪的女性表示開放溝通讓伴侶之間的關係更緊密，即便是分隔兩地。但也有一些女性自述會選擇對伴侶報喜不報憂，目的是害怕伴侶擔心以致在戰場上分心而發生致命危機。因此，所謂的「保護緩衝」心態在這篇研究也被證實。

總結而言，不論是量化或質性研究，皆證實開放溝通的正面價值。但在質性訪談研究發現，有些軍人的經驗也道出妻子的坦白的確會影響工作效能。因此軍人伴侶間資訊揭露的尺度非常難拿捏與平衡。

四、部隊對於與伴侶遠距溝通的限制

最後要討論的是，伴侶夫妻會面臨到來自部隊的限制。由於軍隊有高度資訊安全的考量，軍人是不可以透露與任務安全有關的資訊，像是任務地點和時間，以及任務性質和活動細節。Hinojosa, Hinojosa, 和 Hognas(2012)研究訪談 20 位曾駐外的國民兵成員，即提到作戰與操演任務安全時常干擾到與家人的連繫。諸多限制使他們無法滿足家人對於充份分享彼此的期待。許多研究駐外軍人的文獻也得到相似的結論(Durham, 2010; MacDermid 等人 2005; Faber, Willerton, Clymer, MacDermid, 和 Weiss, 2008)。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兩篇論文討論到軍人伴侶如何因應部隊的各種限制，而發展出媒體使用對策。例如，在 Ponder 和 Aguirre(2012)的研究中，參與者說在駐地營區裡，電話使用的限制最嚴格，因為電話訊號最容易被竊聽。因此駐外美軍偏好用 email 和書信與家人連繫，來得到多一點交談的自由。這一點說明為什麼 email 會是比較受到青睞的遠距聯絡媒體。在 Rossetto(2012)的研究透露有些伴侶會發展出一套暗碼交談，因為如此他們才能維繫開放溝通，又能降低對部隊安全的危害。

伍、結論

軍人將人生最精彩的青壯年貢獻給國家，也將自己全副精力服務部隊，而家庭與配偶仍是軍人生活滿意的主要來源，尤其來自於配偶和家人的支持是最大

的，配偶無私的支持，竭盡心力，奉獻家庭，讓軍官能不斷往前衝刺，追求事業的成功。所以配偶扮演一種穩定的角色，讓我國軍較無後顧之憂。因此如何能充分利用新傳播媒體的即時性、互動性、以及媒體豐富性，讓國軍即使長期輪調駐外，也能與家庭保持通暢連絡，軍人才可以無後顧之憂的投入工作。

近年探討軍人部隊部署和駐外期間與眷屬遠距溝通的研究，因美軍的全球部署與境外戰爭仍持續，所以因實際需要相關研究有增加趨勢，但目前仍有質性訪談居多，長期性之調查追蹤研究依舊缺乏。從本文所選取的文獻可以歸納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媒體在軍隊佈署駐外期的遠距溝通功能上，媒體確實各有所長。但更確切的結論仍然需要更多科學實徵證據才能達成。本文在缺乏本土性與國軍脈絡相關實徵研究，僅憑美軍研究文獻提出以下建議供未來研究議題與部隊諮商輔導芻議。

一、未來研究議題

（一）媒體特性與溝通效能

未來研究可以「媒介同步性」和「媒介豐富性」的理論，對於各種媒體科技用在遠距關係溝通上的利弊得失做更聚焦的研究。舉例而言，當伴侶們遇到衝突情境或是在問題解決時，到底是同步性高的電話，或是非同步性的 email 比較適合？以及不同個體性格和伴侶關係屬性是否有不同適合的溝通媒體？

（二）任務執行效能

未來的研究可以來評估，伴侶們在使用不同的媒體連繫時，是否不同的內容與連繫頻率對軍人執行任務的效能是否產生影響。過去僅有一篇量化論文曾評估過，駐外期間配偶的連繫是否會造成精神不能集中，而導致工作效能不佳。因此需要更多實徵性研究來評估，是否確實有某些媒體或某種溝通內容是比較容易造成工作分心。媒介豐富性強的電話和網路視訊也許有利於親密關係維持，但也可能容易讓前線軍人掛念家人。因此，有關於不同媒體是否有最佳的溝通頻率、內容、題材和語氣，未來的研就可以多著墨。

（三）本土性研究

本文主要仍是以探討美軍研究文獻而得，畢竟，以美國海外駐軍基地長期佈署之脈絡，來類比國軍的營區輪調，條件差距不小，相關實務建議和結論畢竟無法有效適用於國軍營區軍人與眷屬連絡溝通的情境；再者，東西方因社會文化差異，伴侶與家人的溝通模式差別必然存在。因此，探討出遠距溝通和遠距關係對國軍軍人與伴侶或配偶的定義與涵意，以及研究屬於國軍與本土遠距溝通模式實屬必要與迫切。

二、諮商輔導建議

(一) 利用媒介多樣性

新的傳播科技已經讓分離中的伴侶們有更多樣的連絡工具選項。儘管新媒體的媒介豐富性與同步性功能強大，但也不能忽略其他的特性，例如手寫書信和電子郵件。過去研究指出不同媒體有不同優點，也滿足不一樣的溝通需求。建議軍事伴侶們能活用多種媒體的優勢，才能達到充分有效和良性的溝通。

(二) 超越二元(dyadic)雙向溝通模式

二元雙向的溝通模式是一種重要的關係維繫的工具，它可以實際運用於人際互動的行為中，例如，當人們打開來自遠方的溫馨包裹時，或是收到家人的照片時，都能讓駐外人員立即感受「個體內」的自我溝通，無需任何外在的雙向情感溝通。總之，當前的文獻皆強調個體有二元雙向溝通的需求，也就是所有長期駐外人員渴望能收到伴侶的情感支持，只要能透過任何的媒體。以上即是本研究希望藉由文獻分析來提供未來更有建設性的研究與諮商建議。

參考文獻

- 朱美珍、丁華 (2011)。《我國軍隊社會工作：實務及應用》。臺北：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 黃美慧、邊明道、和陳心懿 (2014)。〈新傳播科技與職業軍人婚姻關係維持的初探研究-以社群媒體 Facebook 為例〉。《軍事新聞論壇 2》。臺北：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 Boase, J., & Wellman, B. (200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In D. Perlman & A. L. Vangelisti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pp. 709-723).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S. B., & Renshaw, K. D. (2012). Distress in spouses of Vietnam veterans: Associations with communication about deployment experienc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 18-25.
- Carter, S., Loew, B., Allen, A., Stanley, S., Rhoades, G., &Markman, H. (2011).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ldiers' PTSD symptoms and spousal communication during deployment.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4*, 352-355.
- Carter, S. P., Loew, B., Allen, E. S., Osborne, L., Stanley, S. M., &Markman, H. J. (2015). Distraction during deployment: Marital relationship associations with spillover for deployed army soldiers. *Military psychology, 27*(2), 108.
- Caska, C. M., & Renshaw, K. D. (2011, November). Couple' s communication during deployment: Associations with PTSD, social support,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D. K. Snyder (Chair), Emerging evidence regarding 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in OEF/OIF combat veteran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Toronto, Canada.
- Cigrang, J. A., Wayne Talcott, G., Tatum, J., Baker, M., Cassidy, D., Sonnek, S., Smith Slep, A. M. (2014-). Intimate partner communication from the war zone: A prospective study of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0*, 332-343.

- Dainton, M., & Aylor, B. (2002).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 use in the maintenance of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 118-129.
- Dimmick, J., Kline, S., & Stafford, L. (2000). The gratification niches of personal e-mail and the telephone: Competition, displacement, and complementar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227-248.
- Durham, S. W. (2010). In their own words: Staying connected in a combat environment. *Military Medicine*, 175, 554-559.
- Ender, M. G. (1995). G.I. phone home: The use of telecommunications by the soldiers of Operation Just Cause. *Armed Forces & Society*, 21, 425-453.
- Faber, A. J., Willerton, E., Clymer, S. R., MacDermid, S. M., & Weiss, H. M. (2008). Ambiguous absence, ambiguous presenc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ilitary reserve families in wartim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222-230.
- Frisby, B. N., Byrnes, K., Mansson, D. H., Booth-Butterfield, M., & Birmingham, M. K. (2011). Topic avoidance, everyday talk, and stress in romantic military and non-military coupl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62, 241-257.
- Greene, T., Buckman, J., Dandeker, C., & Greenberg, N. (2010). How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ies can both help and hinder service member' mental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effectiveness on deployment. *Military Medicine*, 175, 745-749.
- Haythornthwaite, C. (2005).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et connectivity effe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8, 125-147.
- Hinojosa, R., Hinojosa, M. S., & Hognas, R. S. (2012). Problems with veteran family communication during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Operation Iraqi Freedom military deployment. *Military Medicine*, 177, 191-197.
- Houston, J. B., Pfefferbaum, B., Sherman, M. D., Melson, A. G., & Brand, M. W. (2013). Family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experience: Child and spouse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quality and associated emotions, behaviors, and reaction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8, 103-119.

- Jiang, L. C., Bazarova, N. N., & Hancock, J. T. (2010). The disclosure-intimacy link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 attributional extension of the hyperpersonal model.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 58-77.
- Joseph, A. L., & Afifi, T. D. (2010). Military wives' stressful disclosure to their deployed husbands: The role of protective buffering.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 412-434.
- Keating, A. T., & Ledbetter, A. M. (2013, April). Relational uncertainty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as threats to friends' everyday talk and clos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Kansas City, MO.
- Kim, I., Kawamura, A., Jerney-Davis, M., Kim, R., Raphael, D., & Lau, J. (2005, May). Relational maintenance during deploym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spou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York, NY.
- Lapp, C. A., Taft, L. B., Tollefson, T., Hoepner, A., Moore, K., & Divyak, K. (2010). Stress and coping on the home front: Guard and reserve spouses searching for a new normal.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16, 45-67.
- Laser, J. A., & Stephens, P. M. (2010). Working with military families through deployment and beyond.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9, 28-38.
- Ledbetter, A. M. (2008). Media use and relational closeness in long-term friendships: Interpreting patterns of multimodality. *New Media & Society*, 10, 547-564.
- Ledbetter, A. M. (2010). Content- and medium-specific decomposition of friendship relational maintenance: Integrating equity and media multiplexity approach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7, 938-955.
- MacDermid, S., Schwarz, R., Faber, A., Adkins, J., Mishkind, M., & Weiss, H. (2005). Military fathers on the front lines. In W. Marsiglio, K. Roy, & G. L. Fox (Eds.), *Situated fathering: A focus on physical and social spaces* (pp. 209-239).
-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erolla, A. J. (2010a). Relational

- maintenance and noncopresence reconsidered: Conceptualizing geographic separa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 169-193.
- Merolla, A. J. (2010b). Relational maintenance during military deployment: Perspectives of wives of deployed US soldier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 4-26.
- Merolla, A. J. (2012). Connecting here and there: A model of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775-795.
- National Military Family Association. (2004). Serving the home front: An analysis of military family support from September 11, 2001 through March 31, 2004. Alexandria, VA: Author.
- National Military Family Association. (2005). Cycles of deployment: An analysis of survey responses from April through September, 2005. Alexandria, VA: Author.
- Neustaedter, C., & Greenberg, S. (2012, May). Intimacy in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over video chat.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753-762). Austin, TX: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Newby, J. H., McCarroll, J. E., Ursano, R. J., Fan, Z., Shigemura, J., & Tucker-Harris, Y. (2005).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a military deployment. *Military Medicine*, 170, 815-819.
- Parker, M. W., Call, V. R., Dunkle, R., & Vaitkus, M. (2002). "Out of sight" but not "out of mind" : Parent contact and worry among senior ranking male officers in the military who live long distances from parents. *Military Psychology*, 14, 257-277.
- Ponder, W. N., & Aguirre, R. T. (2012). Internet-based spousal communication during deployment: Does it increase post-deployment marital satisfaction? *Advances in Social Work*, 13, 216-228.
- Ramirez, A., & Broneck, K. (2009) "IM me" : Instant messaging as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6, 291-314.
- Rossetto, K. R. (2012). Relational coping during deployment: Managing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in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 568-586.

- Sahlstein, E., Maguire, K. C., & Timmerman, L. (2009). Contradictions and praxis contextualized by wartime deployment: Wives' perspectives revealed through relational dialectic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6, 421-442.
- Sayers, S. L., Farrow, V. A., Ross, J., & Oslin, D. W. (2009). Family problems among recently returned military veterans referred for a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0, 163-170.
- Schumm, W. R., Bell, D. B., Ender, M. G., & Rice, R. E. (2004). Expectations, use, and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mong deployed peacekeepers. *Armed Forces & Society*, 30, 649-662.
- Seidel, A. J., Franks, M. M., Murphy, G. F., & Wadsworth, S. M. (2014). Bridging the distance: Illustrations of real-time communication of support between partners and deployed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In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families* (pp. 21-35). Springer New York.
- Sigman, S. J. (1991). Handling the discontinuous aspects of continu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oward research on the persistence of social f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 106-127.
- Stafford, L., & Canary, D. J. (1991). Maintenance strategie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type, gender and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 217-242.
- Tong, S. T., & Walther, J. B. (2011).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nd CMC. In K. B. Wright & L. M. Webb (Ed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98-11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Utz, S. (2007). Media use in long-distance friendship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 694-713.
- Walther, J. B. (199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3-43.
- Weigel, D. J., & Ballard-Reisch, D. S. (2008). Relational maintenance,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marriages: An actor-partner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8, 212-229.
- Wilson, S. R., Chernichky, S. M., Wilkum, K., & Owlett, J. S. (2014). Do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buffer children from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a parent' s military deployment? Examining deployed and at-home parent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 32-52.

Wong, L., &Gerras, S. J. (2010). The effects of multiple deployments on Army adolescent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